

# 重庆文史资料

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编  
学习及文史委员会 编

第九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

# 重庆文史资料

## 第九辑

(总第五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学习及文史委员会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文史资料·第9辑/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

ISBN 7-5621-3734-X

I. 重... II. 重... III. 文史资料—重庆市  
IV. K29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8923 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

学习及文史委员会 编

**重庆文史资料第九辑(总第五十三辑)**

主 编 罗茂材

副主编 张正杰 李邦平

杜宝珍

---

责任编辑 秦 倍

封面设计 王端正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北碚)

(网址:www.xs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4 字数:350 千字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621-3734-X/G·2272

---

定价:25.00 元

慶祝抗日勝利  
中華民族解放  
萬歲

王荷東

# 目 录

重庆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	周 勇	(1)
忆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	姚江屏	(8)
愈炸愈勇的红岩人	孙志慧 许 军	(14)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重庆与第三党交往	杨 力	(24)
《新华日报》在重庆的革命活动	张志凡	(33)
难忘的重庆岁月	于 友	(37)
国府西迁始末	老 田	(44)
八年抗战中重庆的城镇住房	朱敬平	(48)
为抗战而生的汉渝公路	张志凡	(54)
抗战时期重庆桐油、猪鬃等支持盟军情况记述	刘绍璋	(57)
日机轰炸重庆补记	李宗杰	(69)

追忆“重庆大轰炸”	李丛	(89)
蒋介石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中的“重庆大轰炸”	何蜀	(92)
朱德书赞重庆小英雄叶珉书	冯金平	(96)
“重庆大轰炸”中的市民	王群生	(98)
美国记者亲历“重庆大轰炸”	李辉	(100)
江津农民见证击毁日本飞机	庞国翔	(102)
抗日空军英雄周志开	陶梅岑	(106)
锻就利刃斩倭寇	王海达 李闻游 佳	(109)
抗战文化名人与黄山	陈裕容	(117)
歌乐山与抗战文化	曾小红	(132)
抗战文化名人与缙云山	韩丹	(146)
沙坪坝的抗战文化活动	阳晓玲	(162)
重庆夏坝的抗日文化活动	邬冬梅	(188)
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江津)白沙	高冰锋	(206)

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重庆	汪翠华	(216)
抗日宣传女子乡村服务队	丁 艾	(224)
合川人民抗日宣传活动拾零	谢伯淳	(230)
抗日战争中我在求精中学的岁月	蒲 轮	(240)
抗战时期重庆电影	任一宁	(248)
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制片厂	石 曼	(262)
专攻社论的里手宣谛之	肖鸣锵	(278)
周敬承的《抗日金钱板》	张义富	(282)
冯玉祥在江津献金抗日打破纪录	袁一丹 袁先荣	(293)
老兵之歌·抗战追忆片断	王春杰	(309)
王缵绪将军抗战二三事	王 薇	(316)
忆藤县血战，颂王铭章上将	何宏钧	(324)
悼念英雄父亲邵瑞麟	邵蓉子 邵英子	(334)
抗日将军黄杰忠	孙 因	(337)

我在抗战八年中的战斗片断		
.....	伍云春口述 田应良 何用若记录整理	(360)
重叙抗日战事,呼唤“记忆接力”	.....	丁艾整理 (367)
缅怀史迪威将军	.....	曹越华 (372)
“二战”中我给“飞虎队”当后勤官	.....	程君礼口述 曹庞沛整理 (375)
抗日远征军译员生活回忆	.....	卢国维 (380)
南洋华侨抗日服务机工团	.....	诸泽光 (389)
金九在重庆	.....	傅德岷 (392)
崔可夫在重庆	.....	雨 馨 (396)
抗战时期重庆的“台湾革命同盟会”	.....	敬 业 (400)
抗战胜利前后重庆见闻	.....	钟永毅 (404)
陪都重庆庆祝抗战胜利纪实	.....	杨耀健 (415)
海内外人士赞誉重庆抗战	.....	唐润明 (429)
后 记	.....	(438)

# 重庆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

周勇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共同进行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重庆是抗战时期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远东指挥中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处于中国抗战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坚持抗战到底,直至最后胜利**

坚持抗战到底,这是历史的使命和民族的决心。但是,要准确把握抗战到底的意蕴,真正坚持抗战到底,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既取决于坚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决战决胜于战场,又取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一致,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决战决胜于政坛。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围绕这两项任务,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重庆是日本军事进攻中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七七”事变以后，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相继陷落，日军进逼宜昌，兵锋直指重庆。但日军的进攻在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面前不得不停了下来。中国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为了摆脱困境，日军被迫改变方针，一方面加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另一方面加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1938年12月，日军对中国开展“制空进攻战”，“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心”——重庆成为日军战略轰炸的首选目标。日军企图以此破坏大后方经济，增长人民的厌战情绪，特别是与其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相配合，动摇国民党抗战的决心，造成其政权的崩溃，从而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因此，重庆成为遭受日本野蛮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中国城市。

到1942年，日军空中作战以失败告终。7月，日军决定实施从地面攻占重庆的计划：“歼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克重庆，迫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计划日军一部由西安至广元和汉中方向进攻四川，占领成都，夹击重庆；另一部沿长江攻占重庆。日军预定在1943年春季发动进攻。但是，由于受太平洋战争的牵制，日军不得不放弃重庆作战计划。1944年，日军大举入侵广西、黔南，占领了重庆的南大门——贵阳的前沿独山，重庆为之震动。但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日军始终未能踏入重庆一步。

“重庆大轰炸”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整个人类战争史上创下了新纪录。“重庆大轰炸”与“七七”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等一样，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惨痛的牺牲和巨大的损失。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和不容抵赖的铁证。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称：“对一个城市如此长时期固执地进行攻击，不用说在航空战争史上是第一次，就是把地面部队围攻

城市的历史包括在内，也是极其罕见的。”在这场民族的巨大灾难面前，重庆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畏强暴，不惧艰险，顽强抵抗，坚持生产，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敬佩。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专门书赠重庆一幅卷轴，他写道：“余谨代表敝国人民向重庆市敬赠斯轴，以表吾人钦佩该市英勇之男女市民。当该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华政策从军事进攻为主转变为对国民党政府政治诱降为主，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分裂的危险。特别是在国民党内部，分裂投降势力开始抬头，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在重庆大放“和平”烟幕，制造投降舆论。毛泽东同志亲自致电汪精卫，告诫他当此全面抗战面临严重关头的时候，除继续“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外，特别要“坚持举国上下精诚团结之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的规劝与批评没有能够阻挡汪精卫投降的决心。1938年底，汪精卫从重庆出逃越南，公开叛国投敌。在相持阶段，国民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从联共抗日转变为反共、溶共和限共，顽固地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蒋介石打算借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名义，将中国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一个大党”，达到“溶共”目的。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遵循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和方针，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因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使人民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的历史教训，坚持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坚持“合而不同，斗而不破”，与国民党破坏合作、制造分裂的行径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努力维系国共合作。特别是周恩来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

争艺术，妥善化解了“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合作出现的危局，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始终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成功地避免了国共合作的破裂，维护了抗战的大局。

在抗日战争中，重庆没有被日军攻占，重庆人民的意志与决心没有被日军的轰炸所摧毁，以重庆为主要舞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被分裂，坚持抗战，直到胜利，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胜利，是全民族的胜利，也是重庆人民的胜利。

## 抗日战争促成了重庆后方经济中心的形成，支撑了抗战危局

60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审视抗日战争这段峥嵘岁月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重庆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政治上的国共合作，军事上的对日抗战，不仅在于重庆人民为支援抗战而贡献的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热血与生命，还在于抗日战争造就了重庆城市经济的基础——大后方经济中心——重庆经济中心的完全形成。它从经济上支撑了抗战大业，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长江流域经济带，加快了重庆的城市化和近代化的进程，奠定了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基础。

重庆经济中心初步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完全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工业中心的形成。城市经济不论是经济的总量，还是经济的结构，不论是经济的规模，还是经济的辐射力和凝聚力，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盛极一时。

就工业而言，抗战开始以后，中国沿海厂矿陆续内迁，经两年的辗转迁移，陆续在四川、云南、湖南、陕西等省重建生产。其中243家迁到重庆，占全国迁川工厂的93.46%，占内迁工厂的

54%，从而建立起了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与此同时，重庆作为商贸中心的地位进一步确立，重庆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飞速发展，重庆作为交通中心的地位趋于完善。

抗日战争使重庆经济中心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跨出了长江上游地区，达到了整个大后方，从而以“中国大后方经济中心”的姿态独步一时。1937年，重庆工业在全国仅占1.96%。经过抗战，中国在大后方重新建立了重庆、川中、广元、川东、桂林、昆明、贵阳、沅辰、西安与宝鸡、宁雅、甘青等11个新的工业区。在这一地区里，重庆的工厂占了大后方的31.7%，居第一位。大后方没有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能达到重庆工业的整体水平，重庆是名副其实的大后方经济中心。正是这样一个独立而不再依赖于外国，比较完整而足以支持抗战、维持人民生活的工业体系，成为重庆经济中心完全形成的标志。以城市发展为基础，抗日战争促进了重庆城市的全面发展，大后方经济中心——重庆经济中心的完全形成，也加速了重庆城市发展的进程。

### 作为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重庆创造了一系列难以企及的成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座高峰

战时中国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即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抗战文化，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抗战文化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孤岛文化。代表这一时期文化主流的是民族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重庆抗战文化就反映了这一文化主流，并创造了繁荣的高峰。

随着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的确立，文化精英向重庆大量迁移，特别是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在重庆团结了大量文化团体和大批文化人，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南方局以文化为舞

台，“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使之服务于解决抗日与民主两大时代课题，成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举措，积累了党领导文化工作的成功的经验，使重庆文化有了迅猛的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大后方文化的中心。

抗战时期，在重庆聚集了中国的文化精英，产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特别是教育、科技、社科、文艺、文化事业在重庆所创造的繁荣与辉煌是其他区域所难以企及的，使重庆文化成为中国大后方抗战文化的高地，为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抗战期间的重庆文化是重庆反帝反封建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 重庆奉献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岩精神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锤炼形成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冠名“红岩”是因为南方局的驻地叫“红岩村”。

红岩精神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接相连，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处的特殊环境、所进行的特殊的斗争紧密相关。

红岩精神包括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四个方面，其实质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精神风范中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因此，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同具共性，“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特别是延安精神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继

承和发扬。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曲折发展中走向成熟的时代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性的政党公开走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的政治舞台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从“山沟”走向世界政治大格局的开端。

回顾重庆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对于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进一步激励全市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加快富民兴渝、把重庆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60年天翻地覆，60年雄心依旧。面对历史，我们无愧，面向未来，我们无悔。

重庆不朽！

抗战不朽！

中国不朽！

# 忆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

姚江屏

## “内迁而盛，救国而兴”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日本侵略者炮毁枪伤、奸淫烧杀的种种灭绝人性的兽行，让我们永世不忘。

1931年，“九一八”一声炮响，日本侵占了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上海；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宣告了中国抗战的全面大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把枪口对着中国共产党人，致使日军长驱直入。敌人的炮火把国民政府由南京赶到了四川。自此，历史的机遇降临重庆，重庆也就由“内迁而盛，救国而兴”了。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屠杀中国人民的野蛮侵略战争，使中国国民经济遭受极大的破坏，造成了中国巨大的经济损失。沦陷区的工商业不是毁于炮火，就是被敌人占领。农业减产，损失严重。中国战时的经济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为了保证前方的武器弹药和给养，国民政府对千种经济领导机构作了大力调整，调整后的经济领导体制对加强大后方经济建设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与作用的。其具体政策措施是：①充实和加强大后方的工农业生产能力，谋求自给；②对工矿企业采取扶持政策；③各项经济建设要以军事工业为中心，民用产品的生产要服从军用产品的生产；④实行战时计划经济；⑤严格汇兑管理，加强金融统制。办法是：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组成联合办事处，所有有关的金融活动概由四行联合办事处制定，使国统区所有

金融机构高度控制在以四行联合办事处为中心的金融统制网中（引自经济部《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1941年，蒋介石还提出“三分军事七分经济”、“以军事第一与经济国防化”的口号，强调发展战时经济对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作用。西南地区战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抗日战争期间江浙沿海及华东地区的工厂纷纷内迁，为大后方工业奠定了基础。国民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奖励轻工业，扶持手工业的政策。经过几年的经营，基本保证了抗战的物资需要，形成了一个门类较为齐全的后方工业基地。沿海沿江内迁厂矿448家，千辛万苦，历时三年，到1940年基本结束。迁川民营厂矿90%以上均在重庆一带，迁渝工厂约占全部内迁工厂总数的1/3（引自《重庆抗战纪实》）。沿海沿江大批厂矿内迁后，于1940年在大后方形成了新的工业区。其中沿长江东起长寿，西至江津，北起合川，南达綦江，是重庆工业区。从此，重庆既是战时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战时工业经济的命脉。

沿海沿江厂矿大批内迁重庆，在重庆城市史上写下了壮烈的史篇。民营工厂内迁多走水路，过宜昌后，川江水浅滩急，江轮不能使用，竟使用木船850余艘。宜昌至重庆水路全线共长1300里，途经10个县，险滩75处，其中以青滩和泄滩最为著名，木船遇险亦多在此处。风急浪高，逆水行船，爱国实业家、技术人员、广大劳动者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内迁任务，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大无畏的民族气概。

## 重庆的重要地位

从“七七”卢沟桥事变起，抗日的烽火连天，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的灾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一天，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表中国，在重庆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对德国、意大利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次年1月2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同盟国中国战